康熙《大清一统志》的编纂及其影响

董馥荣

一统志是官修的国家地理总志。它涉及全国的山川地理等自然面貌、人口物产等经济情况、疆域险要等重要的军事设施，以及社会风俗、重要人物等诸多方面，是一种重点反映国家当代情况的历史类著作。它也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反映国家强盛、社会安定的代表形式。清朝编辑过三部一统志：[康熙]《大清一统志》、[乾隆]《大清一统志》、《嘉庆重修一统志》。其中[康熙]《大清一统志》是清王朝首部一统志，也是编纂时间最长的一部一统志。它的编纂对于清代一统志及各级方志的编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大清一统志》的编纂起因背景

康熙初年，南明永历皇帝被吴三桂所杀，包括占据台湾的郑成功等抗清领袖人物相继去世，国家政局基本趋于稳定，社会经济随之逐渐恢复发展，地方志书的编纂活动也逐渐增加。康熙十一年（1672）七月初一，大学士卫周祚向康熙帝提议纂修《一统志》，称：“各省《通志》宜修，如天下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圉、险要，宜汇集成帙，名曰《通志》，诚一代之文献也。迄今各省尚未编修，甚属缺典，何以襄我皇上兴隆盛治乎？除河南、陕西已经前巡抚臣贾汉復纂修进呈外，请敕下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成书，总发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1]康熙帝接受了他的提议，明诏有司督促各郡邑编纂志书，以备编纂《一统志》之参考。礼部随后下发咨文，要求各省以贾汉復所修《河南通志》《陕西通志》体例为参照编纂省志，由此拉开了《大清一统志》纂修的序幕。

二、《大清一统志》的编纂过程

第一阶段：康熙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七月，是《大清一统志》的初修阶段，徐乾学是这一时期的主要领修人。因受到三藩之乱的影响，《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工作真正开始的时间比较晚。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四日，礼部奏请开设《一统志》纂修处，请拨给饭桌银两，并且请求将纂修处交纳给内阁管理。二十五年四月，《一统志》馆成立，标志着《一统志》正式启动。大学士勒德洪、明珠等七人担任总裁官。原任左都御史徐元文，内阁学士徐乾学、

[1] [康熙]《山东通志》，礼部咨文。

翰林院学士张英等二十人为纂修官，并命陈敬亭、徐乾学专理馆务。康熙二十八年，因为受到弹劾，徐乾学请旨回乡，行前奏请仿效司马光归洛著书之例，请求将其负责编纂尚未完成的《御选古文》《大清会典》《明史》《一统志》等一并带回继续编辑，并请姜宸英、黄虞稷随往襄助。康熙二十九年，徐乾学由京城返回苏州，在太湖设立《大清一统志》修书局，修书地后又迁往嘉善、昆山。康熙三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徐乾学病故，标志着《大清一统志》编纂的第一阶段结束。徐乾学临终前在谢恩疏中言道：“奉命撰述《一统志》，将次脱稿，奉馆中移文取回书籍，臣前所领《一统志》总裁官敕书例应具本恭缴。除山东志已经进呈外，兹将直隶、山西、江南三处稿本装潢成帙，共计二十套，特呈御览。”据清内阁大库档案记载，第一阶段共完成各省志书三百五十一本，包括山东、直隶、山西、江南、陕西、河南等六地的志稿。[2]

第二阶段：康熙三十三年七月至四十三年八月，是《大清一统志》的续修阶段，韩菼是这一时期的主要领修人。康熙三十三年七月，韩菼出任一统志馆总裁，编修地迁回京师一统志馆。徐秉义、高士奇、王鸿绪等人一同回京参修。韩菼任职期间，对徐乾学所定凡例进行了一些修改。康熙四十三年八月，韩菼卒于官，标志着《大清一统志》的续修阶段的结束。据清内阁大库档案记载，康熙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共完成各省志书一百八十三本。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的志稿数量待考。

第三阶段：康熙四十三年八月至康熙六十一年，是《大清一统志》的后续修阶段。韩菼故后，《一统志》的编修虽然仍在继续，但成书速度缓慢，完成的数量也很少，以致雍正三年（1725），一统志总裁蒋廷锡在总结前朝修志成果时仅提及徐乾学和韩菼等所修志稿，并未涉及其后的修志情况。

从《一统志》馆正式成立到康熙朝结束的三十六年里，《大清一统志》的编纂一直在进行，也形成了“徐本”和 “韩本”等阶段性的成果，但终因徐乾学和韩菼二人的去世而未能完成正式志稿。

第四阶段：雍正三年二月，蒋廷锡、吴士玉被任命为《大清一统志》的总裁官，三月，《一统志》的编纂重新开启。雍正时期对康熙时期徐乾学、韩菼等人制订的修志凡例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雍正六年，进呈直隶志正本，八年进呈山东志正本，盛京、河南、广东、贵州、云南等省缮写正本，其余各省已完成草本的编纂。雍正十年蒋廷锡病故，十一年二月吴士玉亦去世。同年四月，吏部左侍郎任兰枝、礼部右侍郎邓钟岳出任一统志馆总裁官。十一年八月，邓钟岳以事降调，方苞接替为一统志馆总裁。十二年以翰林院侍读学士陈惠华为副

[2] 王大文：《康雍乾初修〈大清一统志〉的纂修与版本》，《历史地理》第三十三辑。

总裁。至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一统志》草稿完成。至乾隆五年（1740）十一月，《大清一统志》正式书稿完成，乾隆九年由武英殿刊印出版[3]。至此，第一部《大清一统志》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约 54 年的时间终于告成，因其所载内容时间下限为康熙末年，因此史称（康熙）《大清一统志》。

三、康熙朝纂修《大清一统志》的作用和影响

1．笼络了知识分子，巩固了国家统治

通过编纂《一统志》，清政府笼络了一批知识分子，对巩固国家统治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精英群体，历来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建国伊始，清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消除知识分子的敌对情绪，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如在顺治二年（1645）国家尚未完全安定的情况下，清廷就举行了首次科举考试，康熙十八年更开博学鸿儒科，以期招揽遗民、吸收人才、争取民心。但是，通过科举考试缙绅仕途的人数毕竟有限，更何况一些态度坚定的人未必肯参加科举考试，因此为了更大范围地吸纳知识分子参与国家事务，清廷还开展了一系列书籍的编纂工程，以此来吸引知识分子。《明史》《大清一统志》就是这样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级文化工程，因此能够引起广大学者的特别关注。能否参加这样重要的史志著作的编纂工作，“不仅是学者学识、学术名望的反映，而且是其学术地位、社会影响在朝廷、官府层面上的体现。”[4]康熙时期就有顾祖禹、徐善、阎若璩、胡渭、黄仪、顾士行、秦亲、唐孙华、吴晾、陶元淳、沈佳、吕澄、裘琏、查慎行、李良年、吴侨、刘献廷、邵长蘅、王原、邵远平、王源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参与了《一统志》的编纂。这些知名学者的加入，不仅保证了《一统志》的编纂水平，而且必然会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从而实现清廷收服民心的目的。此举也引发了更多学者参与修志的潮流，许多著名学者参了各地方志书的编纂，如朱彝尊、黄宗羲、顾炎武、查慎行、方式济、施闰章、宋琬、陆陇其、李元仲、田雯、陈梦雷、张尔岐、孔尚任等等，他们有的直接负责志书的编纂，有的则在幕后参与，对于康熙时期地方志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开启清朝《一统志》的先河

康熙朝《一统志》的编纂，为乾隆《大清一统志》《嘉庆重修一统志》的编纂打下了框架基础。康熙朝编纂《一统志》属于创修性质，此前元代、明代虽然都曾修过一统志，但是因为年代久远，加之战乱之后国家初建，资料匮乏，可资参考的文献比较少，徐乾学在《一

[3] 按： [康熙]《大清一统志》的刊刻时间现尚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以乾隆乾隆九年御制序文为依据，认为刊刻时间在乾隆九年。有以乾隆十六年十月十四日大学士傅恒等奏议为依据，以乾隆十六年八月《大清一统志》全卷刊成为刊刻时间。

[4] 巴兆祥：《 论<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对清代地方志的影响》，《 宁夏社会科学》2004 年 5 月第 3 期（总第 124 期）。

统志凡例》中提到历代舆地类书籍的状况，他说：“其著于《经籍志》所可得见者，惟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九域志》，欧阳忞《舆地广记》、祝穆《方舆胜览》，元《一统志》、明《天文分野书》《寰宇通志》《一统志》《名胜志》诸书而已。其他散轶颇多，折衷匪易。”[5]在这种情况下，徐乾学等人起草了《一统志凡例》作为初期修志的编纂原则，这个凡例虽然后来有经过几次修订，但是奠定了康熙《大清一统志》的编纂基础，也为乾隆、嘉庆两朝一统志的编纂奠定了基础框架。

3．促进了各级方志的编纂和方志体例的统一规范

以编修一统志为契机，促进了全国各省、府、州、县志书的编纂，形成了清代第一次修志的高潮。康熙时期为编修一统志曾两发檄文征收各省通志，各省为修通志又向下征集府、州、县志，截止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内地十七省和盛京完成了第一轮《通志》的编纂，到康熙末年，全国范围内大部分的府、州、县也都有新修或续修志书的完成，现存康熙时期所修方志有 1365 种，是现存方志最多的一个王朝，应该也是修志最多的王朝。

康熙时期为修《一统志》而征集天下志书，同时对于方志的基本内容和体例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内容上要求要包括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等《一统志》所包含的内容，在体例上则以顺治《河南通志》和康熙《陕西通志》为标准，一时之间纲目体成为最流行的地方志体例。

4．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

虽然因为历史的原因，这一时期的地方志存在着总体修志水平不高，内容上疏漏等诸多缺陷，但大多数方志保留了清初的人口、赋税、古迹等原始资料，以及明末清初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经过等，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历史保留了可贵的历史文献资料。除了各地志书所保留的资料外，还保存了大量的舆图、档册等原始资料。康熙皇帝曾下谕要求地方绘制地图呈送兵部，以备编入《一统志》。一统志馆在向各省征集资料的时候，要求同时提供舆图和文字资料，因此一统志馆保留了大量的各省舆图。在这些资料中除了汉文档册外，还包括盛京、蒙古地区的满文图档，如黑龙江将军分别于康熙三十年、三十四年、四十八至五十年，三次将包括舆图和档册的资料移送兵部，再由兵部移交一统志馆，其中就包括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康熙满文本《黑龙江流域图》。这些原始的档案资料，更直接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当地的历史面貌，对于研究清康熙时期东北及蒙古等边远地区的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

[5] （清）徐乾学：《憺园文集》卷三十五 ，清康熙刻冠山堂印本。